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下 册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史 教 研 室

林 志 浩 主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

林志浩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

林志浩 主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 175 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2

1980年5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2版

1996年2月第14次印刷

字数：264 000 册数：470 001-476 000

ISBN 7-300-00080-0
I·5 定价：13.50元

| | |
|------------------------|------------------|
| 826 | 第四章 现代文学“文坛现象” |
| 630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文艺政策 |
| 630 | 第六章 其他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
| 678 | 第七章 人民文学与思想潮流 |
| 620 | 第八章 文艺批评与理论 |
| | 目 录 |
| 第十一章 巴金 老舍 曹禺 | 461 |
| 第一节 巴金 | 461 |
| 第二节 老舍 | 481 |
| 第三节 曹禺 | 495 |
| 第十二章 左翼作家和其他作家 | 512 |
| 第一节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512 |
| 第二节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 522 |
| 第三节 小说领域的新人、新作 | 535 |
| 第四节 左翼戏剧运动及其作家 | 557 |
| 第五节 诗坛上的新人新风及其他 | 566 |
| 第十三章 抗战前期的文艺运动 | 582 |
| 第一节 抗战文艺运动的勃兴和文艺思想的论争 | 582 |
| 第二节 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论争 | 594 |
| 第十四章 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文学创作 | 608 |
| 第一节 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 608 |
| 第二节 诗歌创作的新成就 | 613 |
| 第三节 抗战前后的戏剧 | 635 |
| 第四节 小说创作的新成就 | 647 |
| 第十五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 | |

| | | |
|-------------|----------------------|------------|
| 现代文学的新阶段 | 658 | |
| 第一节 |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的形势 | 658 |
| 第二节 |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奠定及其伟大意义 | 663 |
| 第三节 | 文艺界整风运动和思想斗争的深入 | 675 |
| 第四节 | 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 683 |
| 第十六章 | 解放区的戏剧 | 688 |
| 第一节 | 新歌剧的出现与戏曲改革的成就 | 688 |
| 第二节 | 《白毛女》及其他 | 695 |
| 第三节 | 话剧的新收获 | 705 |
| 第十七章 | 解放区的小说和报告文学 | 710 |
| 第一节 | 赵树理的创作 | 710 |
| 第二节 |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及其他 | 720 |
| 第三节 | 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 | 748 |
| 第十八章 | 解放区的诗歌 | 759 |
| 第一节 |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 759 |
| 第二节 | 其他作家的诗歌 | 768 |
| 第十九章 | 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 | 780 |
| 第一节 |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 | 780 |
| 第二节 | 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和对“主观论”的批判 | 785 |
| 第三节 | 对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 797 |

| | | |
|-------------|-------------------|------------|
| 第二十章 |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创作 | 805 |
| 第一节 | 郭沫若等的历史剧 | 805 |
| 第二节 | 茅盾的《腐蚀》和《清明前后》 | 816 |
| 第三节 | 讽刺喜剧、讽刺诗及其他 | 823 |
| | 胜利的大会师，大团结 | 832 |

第十一章

第一 节

巴金

巴金原名李芾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一九〇四年，他出生于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个专横的封建家长，但由于母亲比较开明，他在幼年时期便能与家里的仆人、轿夫们接近，了解到一些人民的悲苦遭遇。他说：“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①五四运动爆发，巴金受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冲击，贪婪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在此期间，他也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一些作品，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学习，参加了该校反封建的革命团体的一些活动。一九二三年，他离开封

① 巴金：《家庭的环境》，载《巴金文集》第十卷，第61页。

建大家庭到上海，后又往南京，入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学习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曾给他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写的《死去的太阳》就是一部记录“五卅”运动的作品。他于一九二七年初留学法国，一九二八年底回国。在这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广泛地涉猎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的著作，并开始创作和翻译。他于一九二八年完成第一部中篇《灭亡》，在次年《小说月报》上发表，这是他创作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还埋头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卷），并和当时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了一些交往。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逐渐逼近上海、孙传芳的血腥统治越来越猖狂时，巴金在国外寂寞的书斋中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他这样记述着自己当时的心情：“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着一样，那股不能扑灭的火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在这种时候我好像常常听见从祖国传来的战斗的呐喊。”^①他热情地声援两个意大利工人在美国被判处死刑所引起的斗争；他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感到极大的痛苦。就在这样的心情下，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家卢梭怀有极大的尊敬。他回忆说：“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梭的铜像脚下，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摸冰冷的石座，就象抚摸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②这段真实的回顾正好说明了巴金当时崇拜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的原由和他本人的宏大志向。

^① 巴金：《谈〈灭亡〉》，载《巴金文集》第十四卷，第304页。

^② 巴金：《〈灭亡〉前记》，载《巴金文集》第一卷，第2页。

巴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一九二七——一九四六年期间写成的，现已收入《巴金文集》共十四卷。他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参加了当时的救亡运动；一九三三年，参加编辑《火星》、《文学季刊》等杂志；抗战爆发，他与茅盾、靳以编《呐喊》、《烽火》等刊物。

巴金的创作很多，有中篇小说《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雪》、《利娜》、《雾》、《雨》、《电》、《寒夜》等；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火》等；此外，还有许多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在这众多作品中，主题和题材是比较集中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腐朽的封建家庭的深刻描绘，通过对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们开始觉醒的生动表现，展示出现代中国社会封建势力必然崩溃、民主革命必然兴起的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另一方面，他满怀热情地赞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歌唱他们为了摧毁旧世界而献身的英勇精神。可是，由于巴金世界观的局限以及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长期不能正确地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为这些具有充沛革命激情的青年指出真正的革命道路。无论是他最早写成的《灭亡》、《新生》，或者是他自己最为喜爱的《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甚至是抗战时期写的《火》三部曲和《寒夜》，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

此外，巴金也有直接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在《砂丁》、《雪》等作品里，作者不仅揭露了资本家对矿工惨无人道的压榨，而且描写了工人群众日益增长起来的反抗情绪和斗争精神。

特别是《雪》，刻画出矿工们如何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揭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小说曾两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禁止发行，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才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些取材于工人生活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十年代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表现了作者新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劳动人民的由衷同情。但是，由于作者思想和生活的限制，经常把工人阶级作为仅仅是被压迫的阶级，而不是自觉的革命阶级来表现，没有塑造出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形象。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写作的《灭亡》，是巴金最早问世的一部作品。它以一九二五年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阀统治为背景，描写了一个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反抗黑暗势力而走向自我奋斗、直至牺牲的过程。主人公杜大心既具有强烈的反抗现实的要求，又是一个不懂得如何进行斗争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小说第一章题为《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事实上概括了主人公的全部活动和心情。封建包办婚姻迫使杜大心走上最初的反抗道路；黑暗的重压，使他憎恨周围的环境，以至憎恨一切人。他不仅仇恨剥削者，而且也不爱那些不觉悟的贫苦的老百姓。因为他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吃草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象蛆一样的人”。

另外，杜大心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被人称为“诅咒人生的可怕的诗人”，这是因为他主张写诗必须“宣传憎恨”，反对“赞美人生”。这种见解正是他所以参加革命团体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对斗争的前途毫无信心，而且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不需要谈什么理想。在他看来，“以美丽的梦来安慰人们”，对那些在贫穷中生和贫穷中死的人们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认为惟有

替老百姓去复仇，去恐怖地死，才是最为实际的办法。这表明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盲目性。一方面，他决心去替被压迫的人们复仇，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为自己将会遭到的灭亡的命运而感到莫名的凄凉。由于杜大心没有与党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而他始终感到痛苦和绝望。作者强调了杜大心的“觉悟”和群众的“不觉悟”，这样描写的结果正好反映了杜大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心理状态。

作者还以很多笔墨描写杜大心的恋爱生活，并企图通过这方面的描写，表现这一人物具有多种多样矛盾的性格特征。在恋爱问题上，他从革命者不可能得到个人幸福的观点出发，认为革命与恋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李静淑的关系正好是他的“理智和情感的矛盾”、“爱与憎的矛盾”的体现。在他看来，李静淑“是一个爱之天使”，“我应该爱她”；但他又觉得：“我所负的责任乃是担起人间的恨和自己底恨来毁灭这个世界”，已经立誓牺牲个人幸福来拯救人类，不能把有限的精力分到男女的爱情上去。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在杜大心决心去牺牲前的一刻显得格外尖锐。他的革命与恋爱相对立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许多革命知识青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共同认识。

杜大心最终走上暗杀的道路，并在打伤戒严司令以后牺牲了。作者以极其沉痛的笔调描写了这一情节，写到统治者拿杜大心的头去示众，写到戒严司令不仅没有被打死，相反地，却从这个事件中捞到一大笔款子，为姨太太买了不少首饰。作者对杜大心所进行的暗杀行为采取怀疑态度，他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①很明

^① 巴金：《〈灭亡〉七版题记》，载《巴金文集》第一卷，第7页。

显，由于作者当时认识上的局限，他不仅没有批判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而且对这种行为倾注了满腔的同情和歌颂。这便使得杜大心在作品里不是作为一个既肯定其反抗精神、又必须否定他的反抗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形象，而是作为一个值得肯定的革命者的形象被赞美着。巴金曾经把这本书献给他的大哥，并且说：“我写这本书给他看，想求他了解我，让我安心地走我自己的路。”^①因此，杜大心这一形象对了解巴金的思想有很大帮助，同时，在《灭亡》里的这条思想线索，又贯穿在巴金这一类题材的所有创作之中。

在写作《灭亡》以后，巴金于一九三三年写了《新生》。它是《灭亡》的续篇。小说采用日记体的形式，以主人公李冷直接记叙的方式，描写了杜大心牺牲后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鼓舞和生活上的变迁。李静淑在血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决定舍弃一切个人的安乐去给人民谋幸福，到工厂搞工人运动，参加罢工斗争。她认为：“没有信仰的人不能生活，憎恶人类的人只有灭亡。”很明显，她在杜大心的反抗精神影响之下，对杜大心的行为有所批判，而走上了不同于个人反抗的生活道路。作者通过李静淑的行为和认识，暗示出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应该到工人群众中去求得新生的思想。但是，李静淑这一形象还残留着不少原先在《灭亡》里就有的思想局限。当她希望哥哥李冷抛掉个人的小天地到工人群众中去的时候，她又企图“以爱去说服憎”，并相信“爱情”——兄妹之间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能够拯救一个人。这样，她就又回到了自己在《灭亡》里的思想水平。所不

^① 巴金：《〈灭亡〉七版题记》，载《巴金文集》第一卷，第7页。

同的是，在《灭亡》里，她企图以“爱”去拯救整个人类，而在《新生》里，她已经走向工人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仍然停留在企图以“爱”去拯救整个人类和自己的哥哥的水平上。她的这种思想状态，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革命实践和受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影响的根本弱点。在小说《新生》的开头，李冷是一个忠实的“杜大心主义者”，后来经过李静淑的“爱”的诱导，终于加入了工人运动的行列，然而他的认识并无多少进展，他仍然认为“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死的冠，是荆棘的冠，我必须戴这荆棘的冠”。他抱着这样的人生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杜大心形象的继续。

与这些小说相类似，还有巴金自己最喜爱的作品《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它们描写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反抗黑暗社会的斗争。可以说，除去接受了党的领导，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作者没有写到以外，对其他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巴金在这部小说里都着重地作了描绘。这是《爱情的三部曲》比较突出的特点。但与此相联系的一个严重缺点，是和小说《灭亡》一样，作者把那些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肯定的对象，把他们无政府主义式的斗争作为理想的斗争方式来歌颂，把他们的牺牲当作英雄的行为。显然，这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本质。

在《雾》（一九三一年）里，作者着重描写一个优柔寡断、在思想上与封建伦理道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分子周如水，通过他整天沉湎于爱情、又不敢自由恋爱的懦弱、庸碌的性格，表现出这类青年毫无反封建勇气的精神状态。在《雨》（一九三二年）里，作者塑造了一个“热情的、有点粗暴、浮躁的”、在

思想上不能把爱情和革命工作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的知识分子吴仁民，通过他一连串的爱情波折，反映出这类青年总是把革命工作放在次要地位的思想面貌。在《电》（一九三四年）里，作者描写了一群热衷于革命斗争的青年，歌颂他们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感叹、同情他们的无谓牺牲。作者说：“它很适合《电》这个题目，因为在那里面好象有几股电光接连地在漆黑的天空中闪耀。”^①在这部小说里，爱情的气氛较少，主要描写一群青年的革命活动。巴金怀着无限的尊敬描写他们，歌颂他们为了“理想”牺牲了个人的一切。但在《电》里作者究竟描写了一种什么样的“近乎健全的性格”呢？可以从吴仁民、李佩珠这两个形象身上得到说明。在《雨》里显得粗暴和浮躁的吴仁民，到了《电》里已比较成熟，成为一个领导人物了。而李佩珠在《雨》里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到了《电》里却以一种“使人不能相信”的“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所谓“新的姿态”，便是她不沉醉于爱情，准备拿自己的生命来为“别人放散”，从事业上得到永久的安慰。因此，她不仅受到朋友们的爱护和尊敬，连吴仁民也热烈地爱着她。然而，吴仁民也好，李佩珠也好，他们都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都是和杜大心近似的“病态革命家”。他们精神上的病态，主要表现为，在没有得到党的教育的情况下，虽然反抗现实，却看不到前途，因而必然地流露出阴郁和绝望的心情。

总起来说，《爱情的三部曲》是一部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青

① 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载《巴金文集》第三卷，第492页。

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小说。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又脱离真正的革命斗争，他所反映的只能是在黑暗的现实中挣扎、抗争的这样一部分青年的生活，这使他的作品受到较大的局限。

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作品的规模上，都超过了《爱情的三部曲》。这部长篇久已为读者所熟悉，特别是其中的《家》，四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旧社会，它启发和鼓舞了一些知识青年反封建的要求和勇气；在今天，它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的旧社会以及封建旧家庭的罪恶。《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激流〉总序》里，作者写道：“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具着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巴金说的是，在黑暗的旧中国，他看到了有一股充满生气的革命的激流在奔腾，这便是青年一代为反抗吃人的封建礼教和争取自我的解放在进行顽强的挣扎和抗争。至于将来的、理想的“海”，也就是理想的家庭和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巴金认为还没有人能够作出确定的回答。

巴金以自己实际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写成了《激流三部曲》。他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没落，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历史缩影。他付出很大的力量，描

写了封建大家庭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描写了老一代的专横、卑劣和败坏，还写了青年一代的痛苦、反抗和新生。

把《家》、《春》、《秋》合在一起看，它们的题材大体相同，但每一部又都有它的特点和侧重描写的方面。《家》写作于一九三一年。它描写的是“五四”后期，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庭即使在比较“兴盛”之际，也已经埋伏着必然崩溃的危机。这是因为“五四”风暴吹醒了高家的年轻一代，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由于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对高家的生活秩序产生不满和反感，他们强烈地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小说以高家的“少爷”觉慧在“五四”浪潮的激荡下，始而参加社会活动，终于离开家庭出走作为故事的中心线索，层层深入地揭开封建家庭腐朽的内幕，从而表现了这个大家庭中众多人物的各自不同的地位和性格，遭遇和命运。

《春》（一九三八年）是《家》的续篇。它进一步描写了封建家庭里老一代人物的顽固和堕落，刻画了年轻一代的痛苦、牺牲和奋斗、新生。巴金说：“倘使我的作品果真能够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一点点温暖和希望，那么我一生便不是白活了。作品能够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的好的东西，这才是作家的光荣。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愿意我能够做到。”^①巴金正是从这个角度写了《春》，他通过淑英、蕙的不同命运，急切地盼望青年一代起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秋》（一九三九年）以“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过

① 巴金：《谈〈春〉》，载《巴金文集》第十四卷，第355页。

了，春天就会来的”为指导思想，着重地描写了整个高家陷于崩溃的景象。年轻一代有的出走，有的死去。老一代的克明已经无法在第二代人中维持他的封建家长的尊严，也无法阻止他的兄弟克安、克定的堕落，最后被活活气死，从而表明这个封建家庭的不可挽回的彻底没落的结局。这部小说作者是一口气写成的，在艺术上相当完整，为《激流三部曲》鞭挞中国封建阶级并促使其实早日灭亡的总主题增添了一系列色彩缤纷的历史画面。

这部总共一百万字的长篇，它的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将一个如此庞大的封建家庭衰败的历史，描写得十分细腻动人。它为我们展开了大幅的封建家庭的生活图画：“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灭亡”。^①从这方面说，《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这主要表现为作者对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的彻底否定，对统治者的淋漓尽致的暴露，以及对青年一代的叛逆者和牺牲者的深刻同情。这部优秀的长篇在三十年代出现，虽然描写的是“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但在现实斗争中起了进步作用，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激流三部曲》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人物。一方面，有专横独断、荒淫无耻的高老爷和冯乐山，有闲懒堕落的高克定、高克安，有道貌岸然、一心支撑着这个家庭的高克明，也有庸俗、虚伪、专事明争暗斗的陈姨太，等等。在这些形象身上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摧残，青年们过

① 巴金：《我的幼年》，载《巴金文集》第四卷，第114—115页。